

考茨基著

社会革命

社 会 革 命

〔德〕卡尔·考茨基著

何 江 孙小青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Von Karl Kautsky
Die Soziale Revolution
Verlag: Buchhandlung Vorwärts, Berlin 1911
根据柏林前进书店 1911 年版译出

社 会 革 命

〔德〕卡尔·考茨基著

何 江 孙小青 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 印张 92,000 字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 198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

书号 3001·1763 定价 0.40 元

目 录

第一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3
一、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7
1. 社会革命的概念	7
2. 演进与革命	10
3. 古代和中世纪的革命	17
4. 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革命	21
5. 阶级矛盾的缓和	27
6. 民主	48
7. 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	59
二、社会革命后的日子	74
1. 任务的限度	74
2. 剥削者的被剥夺	77
3. 没收还是赎买?	83
4. 吸收工人参加劳动	86
5. 提高生产	94
6. 再生产过程的组织	100
7.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105
8. 精神生产	110
9. 无产阶级统治的心理前提	120

第一版序言

本书的问世，应归功于**阿姆斯特丹社会主义读书会**的建议。这个主要由学术界人士组成的团体曾邀请我在阿姆斯特丹和**德夫特**两地演讲。我提出的几个讲题中就包括有“社会革命”这个题目。因为这两个城市的同志一致同意了题目，而我又不愿意讲重复的内容，所以就把它分为两个内容完全不同、但在思路上却彼此连贯的报告：“改良和革命”以及“革命后的日子”。

嗣后，读书会希望把这两个报告予以发表。对此，我当然毫无异议。但是为了便于广泛传播，我宁可把它交给德国党的出版社来出版；有关的荷兰同志们对此也欣然同意了。

这里发表的并不是报告的原始记录。在写讲稿时我曾写下的有些论点，在作报告时为了避免发言过于冗长而略去了。但本书并未超出原来要讲的范围，也没有因为有所增添而成为巨著。

本书的目的可从书的本身看出来，在此毋需详加阐明。当然，对荷兰读者来讲，本书还有一个特殊目的是针对着下述情况的，那就是在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我做报告之前不久，前任大臣**皮尔逊**曾在公开的大会上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由于其内在原因而失败的断言，并对此进行了辩解。我的这两次报告就是对他的答复。这位大臣先生还如此友好地前来听取了我的第二个报告，并在会上勤勤恳恳地作了笔记，但可惜他并未发言反对我。

但是，我之所以提出社会革命作为我两次报告的题目，除了因

为它既带普遍性又有地方性的宣传方面的理由之外，也由于我的听众主要是研究学术的。在我们中间，学术界人士毕竟最赞同革命思想——至少在德国如此。但在荷兰，情况却有些不同。荷兰听众的情绪使我颇感欣慰，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两次报告并未遇到任何反对，只得到赞同。我希望，这并非完全出于国际礼节上的客气。在荷兰学术界，毕竟有不少非常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我最大的希望莫过于：我的报告能在德国同志中间获得象荷兰同志那样的赞同。在这里再一次对友好接待我的荷兰同志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这是我乐于履行的义务。

卡·考茨基

1902年6月2日于柏林—弗里登瑙

第二版序言

我写本书到现在才四年，但在这四年中却发生了许许多多历史事件，其中主要是俄国的革命。我党在群众罢工问题上观点的改变，最显著地说明了这个短短的期间内情况和观念变化的程度。在本书第一版中，我讲到我的个人见解时，只把这种罢工说成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有效武器，而当时大多数同志还认为这种武器是“荒谬绝伦”的。在今天，我们党内却相反地认为，前一种见解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看法上空前迅速的改变，绝不可能是由单纯逻辑上的论证来促成的，而永远只能是由无法抵挡的事实的发展所促成的。

尽管 1902 年以来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在重新通读本书时却发现，恰恰就在我所论述的领域内并没有什么须作重大修改之处；我当时所预期会发生的某些事情已不再需要说成是大概会发生的了，因为从那以后，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譬如，除了出现上述对群众罢工的承认之外，还出现了日俄战争及其一系列后果。此外，由于发生了俄国革命，我不得不作较大的补充，来阐述俄国和西欧革命之间起点与终点的区别。

仅仅在下述两个问题上，必须放弃我 1902 年的观点。

我今天已不能象当时那样很有把握地宣称，在未来的革命中武装起义和街垒战争已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反之，莫斯科巷战的经验太雄辩了。在莫斯科，为数区区的起义者曾在街垒战中抵

挡住整个一支大军，坚持达一星期以上，如果不是其他城市革命运动失利使莫斯科驻军获得大量的增援，从而集中庞大的优势兵力来对付起义者的话，他们就获得全胜了。当然街垒战只有具备了如下的两个因素才能相应地成功，即一方面城市居民给了革命者切实有效的支援，另一方面军队也毫无斗志可言。但是谁能很有把握地断言，这种情况不可能在西欧发生呢？俄国士兵不过是一些盲目服从的射击机器罢了；他们盲从的程度简直可以与克普尼克^①英雄们的工具相比。但是，他们在大战失败以后又在对本国人民作战中疲于奔命了这么多年，以致连这点儿盲从性也最终被彻底摧毁了。

我要做的第二个改正是关于英国工人的。我在第一版里所叙述的英国工人在政治上麻木迟钝和软弱无力的情况，在这个新版本里不再作为今日还普遍存在的现象来阐述，而是作为一种正在逐渐消失的现象来介绍了。除了俄国革命之外，独立的英国工人政党的出现，乃是最近几年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最鼓舞人心的征兆之一，说明我们向前发展得多么快。现在，英国自由派还有相当强大的堡垒，但是不久也会陷入穷途末路，并且必然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向无产阶级投降，要么向反动势力求援。这后一种选择虽然能使自由派的地位保持得稍久一些，可是一旦无产阶级革命通过暴力夺取了英国的政权，他们就必然会大难临头。我在第一版里所指出的英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从那以后已获得了显著的进展。

由此可见，我要做的改正绝不是违背了、或者仅仅削弱了我已

^① 柏林市内一个区的名称，为1888—1918年在位的德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设置的兵营所在地。“克普尼克英雄们的工具”指普鲁士官兵而言。——译者

经阐述的诸原则。在我看来，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局势的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些原则比以前更中肯、更有充分的根据。

卡·考茨基

1906 年 10 月于柏林—弗里登瑙

一、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1. 社会革命的概念

在社会革命的概念上发生纷纭的争执是不多见的。这种情况有一部分是由于：任何概念都不象社会革命的概念那样与现存的利益和偏见完全背道而驰；还有一部分是由于：象社会革命那样含义多样化的概念本来是为数不多的。

事态过程通常不能象有些事物(尤其是非社会过程)那样可以鲜明地划定一个界限，而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社会愈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愈多种多样，事态过程就愈加错综复杂。在最为错综复杂的事态过程中就包括有社会革命这种人与人之间传统的协作形式发生彻底改变的过程。

人人都使用着社会革命这个词，却各有其不同的含义，而且使用的时期不同，含义也有所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有些人把它理解为街垒战、焚毁宫室、断头台、九月屠杀之类可以想象得出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综合。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词并不那么锋芒毕露，把它看成是社会的无形之中进行的一种巨大的和平变革，就跟发现美洲或发明蒸汽机所引起的变革相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各种各样持中立态度的看法。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社会的整个庞大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或慢或快的变革称为社会革命，并认为

它是由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引起的。

如果我们坚持这一定义，那末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社会革命的概念与“经济基础的变化”区别开来，从而认定后者是由蒸汽机或发现美洲之类引起的，它是革命的原因，而不是革命本身。

但是我不想停留于社会革命的这一定义上，而认为也可以作较狭义的理解，即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任何变革并不都是一场广义上的革命，而只是一种狭义上的特殊形式或特殊方法的变革。

任何社会主义者都力求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但毕竟还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对革命，只想用改良来实现社会变革。正因为有人用社会改良来对抗社会革命，因而出现了今天我们队伍中争论着的矛盾。我在这里只想就狭义的社会革命，即作为特殊方法的社会变革加以论述。

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后者使用暴力，而前者不使用暴力。各种法律措施和政治措施都是靠国家权力来实现的暴力措施。特殊的使用暴力的形式，比如巷战或处决，也并不构成不同于改良的革命的主要内容。它们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不一定同革命有联系，也可能在改良运动中加以使用。第三等级的代表于1789年7月17日组成法国国民议会就是一次没有任何显著暴力行为的出色的革命行动。与此相反，在同一个法国，1774年和1775年为了制止面包涨价这个唯一的、绝非革命的目的而爆发了要求面包定价的大暴动。

但是，指出巷战和处决是革命的特征，也就是指明了我们可以从中探讨革命实质的出发点。1789年在法国发生的大革命，已成为一切革命的典范型式，只要谈起革命，就会首先想到它。它是最能供我们用来研究革命的实质和革命与改良之差异的。在这次革

命前，曾试图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改良)，其中最著名的是图哥^①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的目标在许多方面与后来革命所实现的基本相同。那末，图哥的改革又在哪一点上不同于相应的革命措施呢？那就在于后者是由新兴的阶级夺取了政权而实现的。这也就是革命与改革(改良)之间的主要区别。力求使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这样的措施就是改革。如果这样的措施是由迄今一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治着社会的诸阶级来实行的，即使这些措施不是出于统治阶级自愿，而是在被统治阶级威逼下迫于情势而实行的，那么它们就是改良。反之，如果这样的措施是由一个迄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直受压迫而现在已夺得政权的阶级(这个阶级本着自身的利益，必须利用夺取的权力来或快或慢地彻底变革全部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并且建立起社会合作的新形式)来实行的，那末这样的措施就是革命的产物。

因此，不同于社会改革(改良)的狭义的社会革命，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是由一个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革命。谁在原则上否认政治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手段并力图使变革局限于实现统治阶级所允许的措施，那他就是社会改良派，不管他的社会理想与现存的社会形式何等背道而驰。反之，任何力求由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政权的人都是革命派，即使他想用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取来的改革去准备并加速夺取政权，也仍然没有失去革命派的性质。社会改良派之所以不同于社会革命派，其区别不在于争取社会改革的努力如何，而在于直言不讳地宣布他局限于社会改良。从另一方面来说，政治革命如果要称得上社会

^① 图哥(Robert Turgot, 1727—1781)法国男爵，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1758年曾发表《经济表》)的学生。1774—1776年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曾企图实行几项改革以挽救财政危机，因受特权阶级反对而失败。——译者

革命的话，只有由这样一个迄今一直在社会上受压迫的阶级来进行，这个阶级不得不通过社会解放来完成其政治解放，因为它迄今的社会地位是与它在政治上要居的统治地位相去甚远而且互相矛盾的。诸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纷争，即便可能采取内战这种最残酷的暴力形式，仍不是社会革命。

下面只论述这里已阐明的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2. 演进与革命

社会改良很可能同统治阶级的利益颇为一致，并且肯定会让统治阶级在社会上的权力地位暂时不受触犯，甚至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得到加强。反之，社会革命则一开始就同统治阶级的利益毫不调和，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要消灭统治阶级的权力地位。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总要辱骂和谴责革命。统治阶级一旦认为其地位受到威胁，还要用社会改良的思想来对抗社会革命的思想。他们往往把社会改革吹嘘得上了天，却总是不安心把这些改革在地球上的人间付诸实现。

为了反对革命，可以从各个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方式中找出各种论据。当基督教义还在人们的思想中居统治地位的时候，人们就把革命谴责为罪孽深重地反抗了上帝所委任的统治者。他们可以从新约全书中为此找出足够的证据。因为新约全书是在罗马帝国时代产生的，那时对当权的统治者进行的任何反抗都毫无成功的希望，一切独立的政治生活已全被禁止。革命阶级当然就从旧约全书中找出证据来回答他们，因为旧约全书中曾经保留了很多原始的农民民主精神。

神学的思想方法终于被法学的思想方法替代之后，有人给革命下了一个定义：用暴力来破坏现存的法律制度。但是，既然任何

人都无权违反法律,那末革命权就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似乎革命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法的了。但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却用他们所力求实行的法律,作为永恒的理性法和自然法,也就是以不可转让的人权来对抗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一切现存的法律。这样一来,重新争取人权(人权显然只能因违法而丧失)就简直不可能是一种违法行为,即使人权是通过革命而获得的。

神学的词句今日已不再起作用了,在革命的人民阶层中间尤其不起作用。有关历史上的法律的援引,也丧失了效力。由革命产生的今日的法律和政府毕竟还是为时不久的事物,以至有人不承认其合法性。不但法国的政府,就连意大利的、西班牙的、保加利亚的、英国的、比利时的、荷兰的王朝也都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萨克森这三邦的国王,巴登和黑森这两邦的大公爵,不仅在保持爵位称号方面,而且在获得大片领地方面,都要归功于革命的**暴发户**拿破仑的保护。霍亨索伦王室是在一些王座的废墟上建立其现在地位的,甚至哈布斯堡王室都要向匈牙利革命屈服。1852年被判以模拟象处绞刑的叛国犯安德拉西^①,不是于1867年成了奥皇的大臣而又不背叛1848年匈牙利民族革命的思想么。

资产阶级曾亲自积极地参加过反对历史上的法律的历次突破,因此在它一旦成了统治阶级之后,就不再能以法律的名义来谴责革命,尽管它千方百计地要使资产阶级的法律在哲学上找到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互相一致的依据。资产阶级不得不寻找谴责革命的更有效的论据,他们新的、与资产阶级一同兴起的自然科学的思想中找到了这种论据。例如,认为自然界是以突然的大跃进方

^① 安德拉西(Julius Andrassy, 1823—1890)匈牙利伯爵, 1848—1849年曾参加匈牙利争取摆脱奥地利统治的独立运动, 1867—1871年任匈牙利首相, 1871—1879年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 1879年与俾士麦结成德奥同盟。——译者

式向前发展的所谓灾难改造论^①，在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情况下，就总能在自然科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居主导地位。当资产阶级不再革命时，灾难改造论就被另一种认为发展是产生于不知不觉的点滴积累的观点所代替，即把发展看成是由竞争中无数极微小的进步和适应积聚而成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按其本性来说是容易接受灾变思想的，而保守的资产阶级则认为灾变思想缺乏理性和不自然。

当然不能武断地说，自然科学家的每个新理论都是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需要所决定的。也有另一种情况，例如灾难改造论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恰恰是非常反动，而绝不倾向于革命的。但是，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受着自己所处身于其中的阶级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并且把其中某些思想带到他的科学观点中去。关于达尔文，我们肯定知道，他在自然科学上的假设是颇受汤姆·罗勃特·马尔萨斯这个坚决反对革命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影响的。来伊尔^②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发源于英国，似乎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英国的统治阶级总善于及时摧折革命初露的锋芒，以致英国的历史上二百五十年来只出现过一些革命的萌芽。

一种观点是否正确，当然决不能用它所引起的各阶级对它的喜恶来衡量，但它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后果却要取决于各阶级对它的喜恶。新的发展论之所以很快被广大人民群众欣然接受（他们绝没有可能性去检验它），那是由于它符合了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它对革命阶层来说之所以十分有价值，就在于它比灾难改造论更

① Katastrophentheorie——灾难改造论，或译灾变论，为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r, 1769—1832）所创，认为自从地球产生以来，自然灾害曾使生物界经历了十次至十五次改造时期。——译者

② 来伊尔（Sir Charles Lyell, 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有人称他为近代地质学之父。——译者

彻底得多地否定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而没有任何必要承认世界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用造物行为来渐渐造成的；同时，它又把一切革命或一切灾变宣布为不自然，即违反自然规律的，因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从而使资产阶级非常满意。今天，只要用科学来反对革命，就得用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既把自然界说成是没有任何跳跃的，那末要在社会关系中达到任何突然改变也都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通过最微小的变化或改进（在社会中称为社会改良）的积累，才能取得进步。从这个观点来看，革命是不科学的概念；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对它只能耸耸肩头，不屑为之。

对这种观点可以这样来回答：不加区别地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混为一谈，是行不通的。当然，正如我们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对自然界的观点会不自觉地影响对社会的观点，但这恰恰不是什么有益的事。我们决不应该故意助长这种把一个领域的规律直接移用到另一个领域中去的做法，倒是应该加以制止。诚然，一个领域里的观察方法和认识上的每一进步确实可以并且定会促进另一领域里的方法和认识，但同样确实的是：每一领域总得服从它那不能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独特规律。

应该把无生命的自然界和有生命的自然界严格地区别开。任何人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单凭外表上的相似，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仅仅适用于某一领域的规律移用到其他领域，譬如应用化学上化合物的规律来解决两性生殖和遗传问题。但是，如果把自然界的规律直接应用到社会中去，譬如援引生存斗争的规律来宣布竞争的天然必要性，或从自然界的进化规律推论出社会革命应受谴责，甚或推论出社会革命是不可能的，那就会犯同样的错误。

还可以提出进一步的回答：即使自然科学中旧的灾难改造论已一去不复返了，但那种认为只有通过最微小的不可觉察的变化的积聚才能产生进化的新的理论却越来越发生了矛盾。它助长了